

“‘早期文明中的权力与信仰’ 学术沙龙”纪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内容提要:2015年6月13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的“‘早期文明中的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国内多家学术机构的20余位学者围绕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良渚社会的性质与运行机制、良渚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等议题展开讨论。本次沙龙尝试从研究社会的角度,用历史学、政治学语言描述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而展览亦尝试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对考古学物质文化进行展示,体现了考古学学科的前进和发展。

关键词:良渚文化 早期文明 权力 信仰 社会复杂化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D

2015年6月13日,“早期文明中的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陕西、广东等多家学术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沙龙。该沙龙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同时也是为配合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活动而举办。沙龙的讨论围绕良渚文明的新发现与研究,良渚文明与其他文明间的关系,中国早期文明和复杂社会的相关工作、发展方向以及相关理论与方法问题三个议题展开。

沙龙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以下略去职称)主持,杭侃致欢迎词。沙龙的讨论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回顾了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历程,介绍了良渚古城的最新发现和研究进展。2006年发现良渚古城以来,相关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近两年,在良渚古城内外城垣与水利设施发现的基础上,考古工作的重心集中在古城布局、各人工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及古城的古环境研究上,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2013年以来,在莫角山各人工台基上新发现了数组建筑基址,填补了既往良渚遗址大型

建筑基址资料缺乏的空白;莫角山周围新发现的道路与码头遗迹及其与莫角山的关系,对良渚古城聚落结构布局、莫角山遗址的性质判定有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伴随新的考古发现,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对良渚古城城垣垫石的石料来源、运输方式、单次运载量,堆筑城垣、台基及水坝的泥土的来源,各人工堆筑基址所使用的草裹泥捆扎方式和材料,良渚古城各类人工遗迹的土方工程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苏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丁金龙介绍了昆山朱墓村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及聚落的考古收获。该遗址位于苏州以东,距昆山约20公里,遗址北临草鞋山,南边则是赵陵山遗址,2012年以来已历经多次发掘。考古工作显示,该遗址内可能存在高台墓地,已发现有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田五块,良渚文化墓葬集中在良渚文化中期。该遗址的发现,将了解良渚文化的地方聚落提供新的资料。

二 良渚社会的性质与运行机制

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观察样本,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和运行机制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的 research 核心问题,在本次沙龙中,相关问题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

南京博物院张劭认为,良渚文化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之前长江下游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十分复杂的社会结构,甚至可能是介于古国时代与方国时代之交的最完备的古国,或已是略具方国特征的雏形方国,但是这个文明体似乎并非华夏国家的源头。他从良渚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性质入手,认为良渚时期的社会可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多元统治的神权社会,可能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民主制。从玉器所反映的信仰角度观察,良渚古国可能是一个主要由巫掌控的神权社会;从文献角度分析,良渚古国可能和文献传说中的蚩尤部族有一定关系。尽管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社会分层和复杂的社会分工,但由于原始宗教的形态决定了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相对滞后的医、巫不分的神权统治仍然左右着良渚社会的统治,因此良渚古国是一个充满着先进生产力与落后上层建筑的复杂而矛盾的综合社会,宗教信仰和宗教形态无疑制约着良渚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发展与演进。因此当良渚社会在高速发展之后,社会形态的矛盾导致劳力与经济资源的枯竭,无力进一步支持良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可能是良渚文化衰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为获取新的资源,良渚文化北上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引发了与北方族群的战争,并最终导致了失败。这种冲突,在考古学文化上体现为江苏新沂花厅墓地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文化冲突,在文献角度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中原文化与蚩尤部族间的“涿鹿之战”。另外,海侵造成的环境变化,可能也是良渚文化衰落的部分原因。

上海博物馆宋建认为,良渚古国可能就是一个有共同信仰的复合型古国。以玉琮的获得与延续性为线索观察,良渚社会至少分三级:最大一级是良渚古城;第二级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苏州草鞋山、常州寺墩等遗址,在这两级聚落中,玉琮能延续性地被继承,说明其社会权力的继承与获得相对稳定;第三级如浙江桐乡新地里、普安桥,江苏昆山张陵山等遗址,这些遗址经常只发现有一件琮,说明神权的得到与授受没有持续性。

山东大学栾丰实指出,对史前社会权力的观察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社会内部结构角度看权力的运行,一种是从区域聚落看社会。良渚文化存在多个聚落群,除了良渚区域本身,整个区域的聚落形态结构还不是很清楚。对良渚文化的认

识还达不到北方地区遗址地面调查的精度,所以今后良渚文化区域聚落形态调查方面的田野工作应该进一步加强。从宏观上讲,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能否管控周边,良渚文化的内部社会结构演变,要从时间发展的顺序上来给予整体考虑。对于良渚古城中大城与莫角山的关系,需要根据考古发掘揭示的现象详细排比。大莫角山很可能是宫城,若这一推断成立,则良渚古城当有四重。他对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相对年代,尤其是花厅北区墓地在良渚文化编年中的定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认为,良渚社会的崛起、维系和作为文明体的最辉煌成就都可以聚焦于玉器,良渚的玉文明就是其精神文明的体现。玉器作为良渚社会的权力基础,一方面通过艺术品体现,一方面通过共同的宇宙观体现。玉器影响到良渚社会的各个方面,更会影响到聚落格局与模式,通过玉器与良渚聚落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封闭性。而玉器的扩散,则说明了良渚文化在周邻地区的被接受程度。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推断,良渚社会的统治模式更像是寡头政治体制。神的认同统一在良渚文化早期就已经完成了,过程似乎十分短暂,而且迅速扩展到良渚文化的分布区。统一方式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稀有资源的馈赠、掌控,抑或是财富的影响,目前的材料还不足以确认。但从良渚文化各遗址的箭镞数量看,当时信仰的传播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对于良渚文化而言,神的统一就是信仰的统一,权力从神授予,只是强调了权力的合法性,但是权力是授予多个人,还是一个人,现在只能猜想。也许文献记载的“家有巫觋”时代刚刚过去,可能神权还并不集中。需要注意的是,良渚文化的地域统一不一定意味着古国政体的统一。

南京博物院林留根分析了太湖东部至苏北地区的考古发现,认为相较于其他考古学文化而言,良渚文化的大聚落和城址数量少。良渚古城具有都城级别,也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而其外围逐步可以区分为良渚文化的影响区和外围区,长江以北应该存在良渚文化向外扩张的缓冲地带。苏北地区部分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较为浓重的暴力冲突现象,部分墓葬的墓主因为有暴力征伐的迹象,或许可以被理解为良渚文化的戍边人群。他认为,良渚文化的权力可以达到基层。从聚落和权力物化形象看,不同的聚落间有差异。

冠状饰可能是地方聚落的最高等级权力标志物，是良渚基层权力的一种标识。

上海博物馆陈杰认为，玉梳背和三叉形器的分布区域太广，在良渚古城以外可能并不具备身份的指向性。良渚社会权力的维护，宗教信仰是一种手段，而这种神权是为世俗权力服务的。玉钺作为权力象征，有其形成过程，拥有完整的玉钺是最高等级的体现。良渚遗址群内反山、瑶山墓地时间有交错，福泉山遗址的福泉山和吴家场墓地时间也有交错，似乎暗示以继承制为基础的王权，在良渚文化时期还没有形成。良渚社会可能有不同的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权力集团交替执政，但权力传递还没有形成继承制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国平梳理了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图像艺术，指出从纹饰与造型艺术的角度看，良渚文化承袭了较多河姆渡文化的艺术元素，但二者的艺术品所反映的信仰崇拜则有很多区别：河姆渡文化的信仰中以自然神为多，到河姆渡文化晚期出现了自然崇拜与人的自我崇拜相结合；良渚文化时期则经历了从祖先神崇拜到英雄、权力崇拜的过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品则认为良渚文化晚期的衰落，有两个方面很明显：一方面是良渚社会中小型聚落仍然繁荣，整个社会尚未崩溃，陶器的制作在晚期才达到顶峰；另一方面，玉器加工的停滞代表了良渚社会的衰落。他认为良渚文化在晚期阶段分裂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中心。这些现象表明，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良渚文化的衰落可能是受到了某种挫折，而北上受挫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他认为太湖东南岸的钱山漾文化，就是良渚文化衰变发展而来的。

三 良渚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良渚文化和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各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复杂化动态，是本次沙龙的另一个讨论热点。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比较了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认为良渚文化率先出现权力和信仰，崧泽文化的信仰不太固定，也不太成型。这种转变的宏观背景是长江流域距今5500年前后的社会变革，最大内因是人口增多带来聚落及聚落密度的增加，高等级物需求增多带来了新的社会大分工，带来了聚落分化。良渚社会以石器和玉器加工作为突破口，带来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种变革让公权越来越明显。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对比了长江

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差异，认为良渚社会过分痴迷于自己封闭的社会，因此容易崩溃，反观中原的多元开放则带来了社会的成功。良渚社会衰落后，很多文明的因素也遗留下来，比如玉器、礼制和神人兽面的传承，都对后世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于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都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有所影响。从另一方面讲，良渚文明的消失也可能为中原地区的后继文明提供了借鉴。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讨良渚社会的权力传递方式，以及良渚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讨论了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认为石峡文化应该是良渚文化向西南发展的殖民地，其玉器、石器、陶器和良渚文化都有关系。对于良渚遗址的研究，他认为良渚古城内的宫室建筑，应该有不同的功能区分，居住的人群也应有别。良渚文化的西南扩张，其意义在于让岭南地区也中国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系统梳理了红山文化的用玉方式，认为崧泽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但这种交流是观念的交流而不是器物的交流。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炜林以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的石璧和琮形器，讨论了庙底沟文化的璧与琮，认为北方地区在庙底沟时期已经出现了琮、璧的器用，但尚未形成尊崇琮璧的思想概念。玉器在文明多元一体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琮、璧的传播可能恰是多元一体的形成标志。在庙底沟时期的北方地区，彩陶应该代表一种信仰，彩陶的一致性比其他器物的相似性要大很多。

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戴向明则从黄河中游地区文明演进的历程入手，认为从发展模式看，中原是从小聚落发展成为大型的聚落群，聚落在冲突中逐渐形成；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模式不同，城市的持续时间很长，给人的感觉是社会状态很稳定。良渚社会统治太湖地区，更像是盟友关系，而不是垂直统治。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洪海以齐家文化为例讨论文化的传播问题。他认为，只有具备年代学的细致比较的基础，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文化比较与传播结论。大格局、大空间的比较，一般是在大时间刻度上进行，但相互间的传播则要用细致的时间刻度来进行比较。齐家文化社会与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差异，以及齐家文化中玉

器、金属器的来源问题,都需要有更多的基础考古材料后才能深入探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认为,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西北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也出现社会的分化,但是分化方式与良渚社会不同。与此同时,黄河上游出现了两套与权力有关的东西,一套可能是黄河流域传入的,另一套则可能是来自于西方。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明奎则对比了大汶口社会与良渚社会,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墓葬等级很高,但是没有良渚这样高等级的聚落。大汶口文化向南已经到长江流域,不过目前还没有区域聚落中心出现。但山东半岛在龙山文化时期发展程度更高,这种社会发展的动因和路径不同,导致了文明体的崩溃或者兴盛。

四 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理论与方法

对理论和概念问题的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界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次沙龙针对中国文明形成与社会复杂化问题的若干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信仰、权力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从政治学意义分析,权力是把观念强加给别人,其基础是需要有必要的手段作保障。从各文明的通例观察,这种强力的手段往往依靠军队和刑罚,光凭德治往往无法保证观念的强力推行。而信仰则往往是发自内心的,能自觉地执行。因此,在社会意志、观念的统一过程中,信仰是内因,而权力则是外因。权力在社会层面的表述中,往往是针对公权而言的,换言之,也就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而在考古学社会复杂化研究时,又需要在“权力”中明确如财产权、性别权等私权。从既往的考古学研究来看,研究者在判定遗物、遗迹时,很容易模糊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具体到良渚文化,通过公权可以获得的附属物可能是冠、权杖,这些附属物或许是隶属于表达神权权力的玉琮。公权还可以获得的就是能侵占更多的财产,而这又引起私权即财产权的界定问题。他提示,未来的研究应该注意权力运行基础中权力的公、私差异所起的作用。

上海博物馆宋建认为,文明和国家不是一回事,但为了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应该重新厘清相关概念。比如国外学者会讨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崩溃带来了埃及国家的产生”这样的议题,

其“新石器时代文明”与中国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文明”概念有差别。因此需要就中国各考古学文化的实际情况对“文明”和“国家”进行重新区分,而不应以一个概念统属目前的考古现象。就良渚社会而言,用国外学术界的概念来看,可能更接近“酋邦”状态。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认为,文化的边界和权力的边界是相同的,早期中国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权力概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认为,要系统考虑权力与信仰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是先有权力还是先有信仰。若权力在先,则信仰就是附属于权力的精神鸦片,用来维系权力的运转。良渚的思想就是唯玉独尊,国家的统治者和道德准则就是信仰体系、价值观的建立,可能就是这种表现。若信仰在先,那就是基于共同的信仰而建立的世俗权力。目前还不能明确确定良渚文化中权力与信仰的互动关系,但考古材料似乎倾向于权力在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认为,这次展览和沙龙的讨论,会让学术界思考如何利用考古资料理解国家和权力的问题,用考古资料去描述权力的细节,还可以做具体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实际上就是论证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庙底沟文化、凌家滩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后期晚段、红山文化阶段交互作用圈的形成阶段,就是中国文明最初的形成时期。良渚文化的伟大在于,它向各考古学文化及后继的各文明体,展现了一个社会可以组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修建大型公共设施,形成超大社会组织的发展道路或蓝图。这在无形之中建立了划时代的文明标准,开创了新的时代。因此,良渚文化的若干文明要素得以为后世的文明所继承与吸取。

广东省博物馆魏峻介绍了该馆“印记岭南——粤港澳考古成果展”的策展和展览过程,借以对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此次的“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分析将考古成果转化成为公众便于接受和认知的形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先生参加了讨论,他认为,以高水平的沙龙形式,开放性地探讨良渚文化的前沿问题,而不做发言的预设,让学者畅所欲言,用较为灵活的形式进行学术讨论,是学术进步的表现。赵辉对大会作了简单总结,他指出,从良渚文化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所体现的中国文明研究的进

展,说明考古学家开始从研究社会的角度,以历史学、政治学的语言去描述考古学学科的语言,这是考古学学科前进的体现。而以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将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转化为博物馆展示语言,扬弃了通史陈列或仅以精美器物为中心

的器物学审美展览模式,在博物馆陈展理念上也具有前沿意义。这次的良渚文化沙龙为这种研究和展示的转化发挥了示范性作用。

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常怀颖

(责任编辑、校对:毛颖)

Summary of the Workshop “Power and Belief in Early Civilizations”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orkshop of Power and Belief in Early Civilizations was held at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on June 13, 2015. It was one of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Power in Things: New Perspectives on Liangzhu”,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the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More than 20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attended the workshop and conducted discussion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Liangzhu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Liangzhu Culture; the nature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Liangzhu society;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other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theories and methods adopted in studying the origins and early stag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aking a social studies perspective, the workshop tried to describ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heritage by borrowing concepts and ideas from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tudies. The exhibition itself also adopted a sociology and history perspective in exhibiting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archaeology with a reflection of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chaeology discipline.

Key words: Liangzhu Culture; early civilization; power; belief; social complexity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征订启事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收录了《东南文化》自创办至第200期(即《文博通讯》1975年第1期~《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的全部篇目,按学科、研究领域及内容等分类,共分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物研究与鉴赏、建筑与园林、书刊评价与学术动态、知识介绍及其他、图版等十一部分;另附录有作者姓名索引与《东南文化》2008、2009年目录索引。《索引》内容全面、分类科学,是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及遗产研究与保护、文化史论、艺术史论、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及考古文物爱好者检索、查阅的工具书。

本书装帧印刷精美大气,为大16开本,257页,订价68.00元。需要者可直接向编辑部订购。本刊在收到订单及书款后,即时邮发。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

联系人:何刚

邮政编码:210016

电话:(025)84806201

E-mail:dnwh@chinajournal.net.cn

《东南文化》编辑部